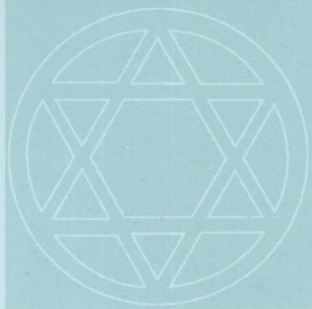




哲学研究论丛
ZHEXUE YANJIU LUN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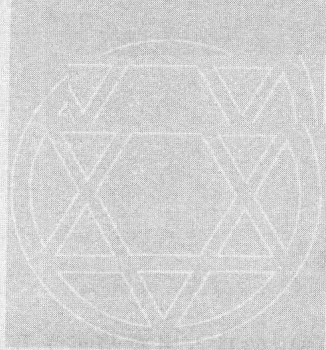
追思政治：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 政治哲学及其中国话语

ZHUISI ZHENGZHI:XIANDAIXING SHIYUZHONG DE MAKESI
ZHENGZHI ZHEXUE JIQI ZHONGGUO HUAYU

炎 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哲学研究论丛
ZHEXUE YANJIU LUNCONG

追思政治：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 政治哲学及其中国话语

ZHUISI ZHENGZHI:XIANDAIXING SHIYUZHONG DE MAKESI
ZHENGZHI ZHEXUE JIQI ZHONGGUO HUAYU

炎 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思政治：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中
国话语 / 炎冰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 7
ISBN 978 - 7 - 5171 - 1454 - 3

I. ①追… II. ①炎… III. ①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5859 号

责任编辑：肖凤超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9.75 印张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454 - 3

自序

自从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西方的政治哲学一方面打破了分析（语言）哲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同时也让自密尔之后沉寂了百余年之久的有关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的研究重新被推上了学术前台。当然，其中更有“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金融资本的畸形活跃和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等外在因素的直接导演。于是，像以诺齐克和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桑德尔和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以及黑尔和布兰德为代表的新功利主义等诸多流派纷纷登场，并日趋成为西方哲学场域中的主流与显学。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作为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异质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成了西方众多学者重新回望与研判的对象（如金融危机后的重读《资本论》等），而西方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应上述诸派别的理论纷争和探研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是本能地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再度挖掘和重新梳理，以便寻觅到新的学术资源。

从国内情况来看，较之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研究虽然相对较晚，但势头正盛，特别是200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为主题的论坛之后，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方位自觉认知已经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渐次预热起来。人们或在引介西方政治哲学学说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作为理论坐标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分析，我将此类研究简约为所谓“以西方政治哲学引介为契机的比较性研究”；或在政治学研究中将散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诸多政治思想加以梳理，进而依据其概念寓意与价值判断对政治学相关原理予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说明，即所谓“以政治理论学科建设为本业的梳理性研究”；或围绕市场化、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等时代背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人学研究”与“现代性”批判等）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相关概念进行再诠释，使之赋予时代内涵，即所谓“以历史

唯物主义重建为预设的诠释性研究”；当然，更多的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威权主义、权力寻租、资本扩张、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等问题，试图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以寻找救治良方，即所谓“以中国社会问题剖析为主旨的诊断性研究”。如此等等。实可谓林林总总，姹紫嫣红，蔚为大观。

诚然，如前所述，政治哲学在中外学界的火爆，既与早已成为“古人”的一批西方政治哲学家们遗留下的那些关乎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诸多重大课题的苦索与追问且多少有点“无疾而终”味儿的未果之思紧密关联着，但铁铮铮的事实是它源自我们这个时代的“召唤”！借用当年马克思的比附来说，这是一个资本“先生”携着技术“太太”和权力“媒婆”而满面春风、潇洒自如地周游列国的时代，也是被今日政界、学界和媒体挂在嘴边、且正面褒扬的所谓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在这场注意到，当今人类之身体化于其中的这个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给人类带来巨额物质财富加速增长的同时，也让这个世界物欲横流，尊严扫地，良知泯灭，责任空无，名、利、权、色似乎成了每个当下人心目中新的神祇，那种疯狂与贪婪，那种执着与不竭，那种颠倒与异化的画面，足以让许多文学大家们难寻辞藻而贴切表征之。虽然“朱门”未必会让“酒肉臭”，路边亦未有多少“冻死骨”，但那种在生存面前的内在自拘性的自残，或因遭遇外在不公时的状告无门而体味出的无力、无助和无奈，足以让每个普通百姓不寒而栗，午夜惊魂。于是，所谓公平、正义、权力、权利、自由、民主、阶级、政党、剥削、异化、宪政、良治、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群”与“问题域”重新涌上了政治哲学的学术平台。而作为坚定且不屈地以批判资本主义，谋求人类（尤其是最广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终生旨趣的马克思再一次被当下的人们所注目与反复“重读”。诚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吉登斯所言，“马克思主义以前也被宣称过死刑。但却不止一次从骨灰中爬起，而且经常是那些试图挑战它的思想流派使它重获新生。”^①这大概便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备受今人青睐的根本原因吧，以至于就连我这个似乎不太喜欢多问社会现实问题的学人也止不住躁动起来了。

我原本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科学技术哲学，^②但同时又兼任着全校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后改为《邓小平理论》，现又改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①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 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我的第一本文集《追思科学——历史与哲学视域中的科学话语》（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了该书的新版）中。

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公共政治课的教学任务,并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上做导师。后来随着扬州大学各学院和专业的多次分分合合,我最终被转至商学院的公共管理专业。一来二去,使我所关注的问题一再地被“拓宽”,研究的方向一再地被“转向”。当然,真正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兴趣与眷恋还是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士的时候,在那里我深深受到了孙伯鍈、张异宾两位老师的理论感染,甚至是直接冲击。记得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孙伯鍈老师以其平凡中掘真识、细微处见大义的‘深度解读法’启示着我如何萦思与提问。对于博士论文的写作,我曾依仗着同乡之谊和他的一贯慷慨,窃得不少灵感和旨趣。现在孙老师走了,我不敢将这堆文字献给他,唯恐他会斥责我的粗陋与疏浅,但我愿告慰还未走远的他,学生一定会以此为原点而继续向前的。此外,张异宾老师给我的警示与磨练更让我终身难忘。每每在他的课堂上,或捧读他的著述,无不使我如坐针毡。他那极度个性化的思之浪涛和‘后现代式’的利剑每每震撼着我不断去追索和鏖战。虽然我不是他的门内弟子,但对我的偏爱与帮助却远远有过于‘他者’。”^①所以,当博士毕业后,我便逐步转向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场域,大有“我把青春赌明天,何不潇洒走一回”的莫名亢奋与冲动。

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该如何“上手”呢?毕竟在学界有关马克思的研究著作早已是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了,大家、名家一拨挨着一拨。况且,对于处在“知天命”与“耳顺”岁月之间的我来说,实有“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的无奈与怅然。可思来想去,学问之道绝不像生财之道或为官之术那般“邪性”,此门从无捷径可循,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或冒险。于是,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孙先生的教诲,那就是仔仔细细、踏踏实实由研读马克思的文本开始从头来起。当然文本解读需要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有鉴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我更注重于将马克思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前人或同代人的思想资源、他自身的知识架构与理论旨趣以及生活经历等要素,同文本的主旨立场、叙事逻辑相融合,站在今日之中国学人的价值立场上进行某种“互文性”的思想对流,姑且可称之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新常态’研究”,当然也是我在多个学术场合自诩的所谓“个性特色”。这一尝试确实让我有种“井底之蛙”般的自鸣得意,但却无怨无悔,这也便有了这本文集的主题——现代性视

① 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全国著名的科学思想史专家林德宏教授,先生的学识与睿智在同行中是闻名的,他的那种史诗般的哲思和言语,那种童心般的真实与赤诚,那种慈父般的仁爱与宽厚,至今常常萦绕在我的眼前与脑际。我这里谈及孙、张二师的影响,纯粹是从专业“转向”意义上所指的。

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中国话语。

古人云：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我的所思、所作，当然不会巴望着能够悬壶济世，整饬时弊，更不敢奢望什么史笔垂青，声鸣高远，只是记录下作为思者的我曾经的一段历史过程与一行蹉跎足迹罢了。思了，无怨无悔；写了，悦哉快哉。

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	1
----------	---

上 篇

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的方法问题.....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重维度	15
伪自由、异化劳动与拜物教——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21
伪自由逻辑批判的逻辑——重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	35
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45
论“自我意识”哲学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58
利益魔咒下法律正义的虚假本体	
——重读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72
国家精神本体中的自由幻象	
——重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价值	85
国家与市民社会：“颠倒逻辑”的再颠倒.....	98
政治权力异化后的社会正义之殇	
——续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逻辑.....	110
启蒙的本态与悖结——康德的《何谓启蒙》之解读.....	122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的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131
金钱异化及其罪源——赫斯《论货币的本质》之文本解读.....	148
死去的马克思与活着的马克思	
——直击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重大误区.....	161
人学研究的意义与向度.....	164



下 篇

“现代性”之语义学辨正——一种知识考古学审觉	169
“后现代”之概念谱系考辨	185
语用分析与后现代科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的文本解读	200
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	214
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方法论原则	222
如何讲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27
如何讲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33
论江泽民的科学技术观	238
论江泽民的科学精神观	247
论江泽民的科技创新思想	257
论江泽民的科技人才思想	265
论江泽民的科技价值观	276
论江泽民科技进步观的十大方面	286
论江泽民的科技体制观	295
垒学人之家园，还学术以净土 ——为《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 25 周年而作	302
后 记	304

上 篇

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的方法问题

内容摘要：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是确保其沿着科学路径前行的理论前提。为此，我们撷取了当前学界颇受争议的三大问题进行论析，并主张只存在“多”中之“一”和“变”中之“不变”的“一个马克思”，而非“两个马克思”，力挺以“认识断裂说”而反对“线性进化论”来研究马克思。同时指出，只有认真严肃地对待“历史的马克思”，方能更好地思考“当代的马克思”。

随着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和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出版以后，在本世纪的中国学界，有关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再度成为话语焦点和学术热潮。一时间，非但各种“问题域”中的马克思之研究成果频频现世，蔚为大观，而且围绕马克思思想研究本身的观点纷争亦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整体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的当代性”以及“后现代的马克思”等口号频繁出现在报端刊首。思想争鸣固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但另一方面也极易造成不必要的理论混乱。于是，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极易被研究者忽视与歧误的学术前提，即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事实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错位与扞格才导致了争鸣双方的论旨与结果愈加趋向两极。因此，有关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就成了当下学界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理论前提。

一、是“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

所谓“两个马克思”，原本是指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为界标），这是一个以推翻剥削制度、谋求无产阶级最终解放为己任的“革命的马克思”；二是成

熟的老年马克思（以《资本论》为界标），这是一个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与矛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宏旨的“科学的马克思”。客观地说，这种划分是在充分解读前后两个时期马克思的文本主旨，并结合其政治活动乃至生活经历的异质性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其合理性是显然的。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同样也是显然的：非但割裂了早晚期马克思思想内在的逻辑关联，而且势必造成前后“两个马克思”的互悖与对立，甚至会让人们误以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之前的马克思缺乏对前人的理论财富（如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的合理继承，仅凭自己的政治意向和天生的逆反心理任意编造《宣言》的革命主张。不过，这种“两个马克思”的论调在当时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上还未产生过多少实质性的消极影响。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的一大批早期文本的整理出版，如《中学作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等，有关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状貌和主旨论域不仅以全新的面目进入读者视野，而且与晚年马克思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于是，不少西方学者以“重新发现的马克思”为旗号，将原本的“两个马克思”加以细化后又推向了极致，即以抬高与放大早期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来反对与贬抑晚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例如德·曼在《1844年手稿》出版以后就仓促地做过这样的评注：“或者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算作马克思主义，那么，无论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彻底地重新加以修正；或者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算作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另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引证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①由此，他还推论出这样的错误结论：“无论对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给予多高的评价，但是从这些著作中可看出他的创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停滞和减退”。^②原苏联学者奥依则尔曼也认为，《1844年手稿》的“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真正现实的人道主义的伟大思想，在这里或者提了出来，或者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述的。”^③这种“两个马克思”的论调不久便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思与价值评判的依据，以及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哲学基础，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上世纪

① 转引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② 转引自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页。

③ 奥依则尔曼等：《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90年代前后中国“新左派”（包括其各种理论变种）的思想导火线。最近，我国学者朱立元又撰文指出了国内学界实存的另一种从相反方向制造了“两个马克思新神话”，即他们“竭力贬低《手稿》，否定《手稿》思想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思想的连续性，认为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指责《手稿》仍未超越唯心主义，并认为马克思后期完全抛弃了《手稿》的基本思想。”^①朱先生的这种抱怨虽不无道理，但其隐形逻辑无疑是反对这种“两个马克思”而主张只有“一个马克思”的。

以上状况表明，究竟是“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不仅成了有关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所涉及的第一个基本的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人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时不得不加以直面的理论前提。当然，专门讨论《1844年手稿》的主旨及其与后期马克思著作的关系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究竟是“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笔者的观点是承认“一个马克思”而反对彼此对立的“两个马克思”，但“这一个”马克思又不是纯粹的“单一”，而是“多”中之“一”；“这一个”马克思不是僵化不变之“一”，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研究视域的转换而逐渐深化着的“变”中之“不变”之“一”。

在传统的学术语境中，只存在“一个马克思”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理由很简单：其一，对于进入当下研究者视域的任何一位历史人物或文本，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其视为一个“完整一致”的生命个体，或探讨其历史境遇，或再现其思想主旨，或评价其是非曲直，甚至习惯于以其取得的最高（最终）成就（或学术观点，或社会地位）之标杆去回溯与寻觅其早期活动的“未来身影”，却很少去关注因作为生命个体存在本身与其时代主题、个性特质以及文本生成的语境转换密切关联而必然导致的思想的异质性。其二，由于上述思维定势的使然，当下的研究者（静）面对历史的（动）同一人物、同一或不同时期的文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专业旨趣和学术目的出发，去静观论主的思想要旨，或以图“完整地”再现其“历史原像”（我注六经），或为谋求一己的理论创造而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予以佐证和辩护（六经注我），传统教科书的隐性逻辑便是如此。其三，作为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似乎从一踏入中国大地后，他就以一种圣形伟影呈现在国人面前，因而人们非但习惯地“跪着”仰视其声像而不敢（实际是无此种“自我意识”）真切地、平视地与之对话，而且习惯于将马克思非历史地预设了不同文本之间的思想同质性，“这一个”马克思近乎从写作《中学作文》开始直到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他在其中所

^① 朱立元：“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9日。



说的每句话都可以不加特设地作为“真理”来引注，更不用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内容了。

笔者这里所标举的“只有一个马克思”，当然不是上述意义上的“那一个”马克思，我们所说的“这一个”马克思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来加以辨识的。

从本体论上说，“这一个”马克思是指作为生活在 19 世纪（1818—1883）德国（当然也包括英、法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实存的“那一个”生命个体和思想特立（当然也包括此前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他者”之思）的马克思。强调这一点似乎显得过于肤浅，我们当然知道胡适先生早就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少女”这样的话，也知道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知道从解释学的角度说，面对同一文本采用不同的解读方法，尤其是因读者已有的知识架构和主观意图的差异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解读结果，更知道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当下）要想真实地复现过去的社会存在与思想原貌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真理的乌托邦。但我们强调只有“这一个”，恰恰是任何历史和文本解释的前提与依凭。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不同专业视域的当下研究者而言，由于知识背景的遮幅性存在，人们往往会读出各种不同角色的马克思，如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或者政治学家的、革命家的、历史人类学家的甚至后现代思想家的马克思等等，但“这一个”马克思原本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多”中之“一”），并不存在学科壁垒森严、边界分明的乃至碎片化了的“多个”马克思。

从认识论上说，“这一个”马克思作为物质性生命存在和精神性思想存在，首先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因此，虽然随着其生活境遇、活动经历、阅读边界和理论兴趣的变化，其思想不仅有量性扩张，更有质性飞跃。例如从大学阶段的文学浪漫主义到《博士论文》中对“自我意识”的确认与推崇，从《莱茵报》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学批判，到《1844 年手稿》时的伦理学批判，从《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宏观历史唯物论原则和无产阶级使命的确认，以及其间参与的各种政治反抗活动，到《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批判（微观历史唯物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乃至晚年对历史人类学的浓厚兴趣等等，其认识立场的多重转换和思想复调逻辑的多向度呈现是当然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路上”的思想者，马克思的理论创制又总是与那个时代的认知背景和主体自身的特质紧密关联着的，所以，脱离了时代主题和马克思的个性特质去解读其文本寓意，甚至以今人的立场“借尸还魂”，按这种读法尽管人们可以读出各种马克思的“新意”，抑或美其名曰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但笔者以为，这实际上已经是在用一种阉割复油炸的方式活生生地

把马克思屠杀了。

从价值论上讲,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世人对它的褒贬与争议就形同水火,姑且不论持不同阶级和政治立场的人们是如此,即便“同一阵营内部”的研究者的对峙与两立也是十分昭著的。如“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政治新思维”与“斯大林模式”之争;“标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之争,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在理论界出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争,以及后来的“体系派”“方法派”与“对话派”之争^①等等。但在我看来,虽然不同时期的马克思在理论场域、思想重心、认知水准及至最终结论(不同时期还有错误)方面有所变化,但他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两大价值主旨,即对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世界与必然王国)坚定地科学批判和谋求人类特别是最广大被压迫阶级的彻底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并未改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存在资本剥削、权力压迫和阶层对立,“这一个”马克思就会成为人类思想史研究中永远不可忘却和逾越的界碑。

此外,从单纯的学理层面上讲,马克思从早期的法学、哲学到后来的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转向,也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单纯是出于马克思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而是有着更为深沉的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那就是马克思总是随着他所研究的问题本身的深化、延展,特别是同他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的较量(或吸纳,或批判)路途中而体现出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对此做详尽的微观论证将是另一个饶有兴味的主题,我们将在别处另作笔墨,这里只想说一个大概。例如在《博士论文》中,从显性层面上说,马克思以黑格尔“自我意识”为武器,借助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思想基础——神学独断论进行了批判,目的是从哲学意识形态的道义上拯救人类(体现在他对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颂扬)应有的自由与幸福,但其隐形的困惑却是这种现实的人的奴役关系何以可能?哲学地拯救人类的方式能否有效?虽然此时他已经天才地敏感到“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②但究竟如何认识这种“现实关系”以及如何寻觅这种“自然力量”,恰恰成了此后的马克

① 参见拙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科学路径”,《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思反复探究的学术焦点，包括他后来在《莱茵报》时期接触到现实的经济问题后的醒觉与顿悟，《1844年手稿》中提及的资本、地租和劳动的背离（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开始站在现实大地上（古典经济学理论）对青年黑格尔派有关德国社会批判所做的批判，直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改造，对资本、地租的本质的科学解析，进而对现代性社会中普通实存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所顶礼膜拜的三层物相逐一剥离还原为假象视域，以说明此类物相何以在构成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同时所遮蔽着的更深层对立着的社会关系，从而凸现出作为历史性生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性存在”本身同样是历史的、暂时的，等等，无不充分表明“这一个”马克思的思想脉动的一以贯之性。

二、是“线性进化论”，还是“认识断裂说”

是“线性进化论”，还是“认识断裂说”实际上是与“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的问题紧密关联着的。“线性进化论”似乎也是传统史学界的一种思维定势。历史常常被理解为过去如何逐渐走向当代的历时性过程，人类社会似乎总有一个既定的终极目标与特定走向，当人类朝着这一“预设目标”发展的途中，尽管也会充满着偶然、彷徨甚至倒退，但其总体的大趋势似乎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的线性进化过程。这一思维定势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思想研究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以近代的伽利略为隐性标杆，看其如何朝向实验科学和数理力学方向而靠拢的。同样，研究近代科学史，就是分析各位科学家又何以朝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方向前进的。人文科学中的思想史研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理路亦然，当下的历史研究者往往总是习惯于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基于其知识架构与价值评判）去回溯和反观过去（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或思想过程），看其如何走向当代的过程细节及其变化规律的。同样，在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中，人们除了以《资本论》的结论或唯物史观为最终标杆外，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霸权作祟，似乎马克思总是一贯正确地时隐时现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此阿尔都塞就曾深刻指出过，这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是意识形态式的“非历史的幻觉”，其隐形逻辑不是从历史的现实出发，而是“从他的‘答案’出发的，是作为它的答案的确切的反映提出的……是按照人们的愿望为了使意识形态的解答成为这个问题的解答而不得不提出的问题。”^①以笔

^① 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